

Difficult to Cross Identity: Acculturation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a Polymedia Environment

Xi Xu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have gone overseas to study, and the issue of how social media affects the integration of this cross-cultural mobile group into the new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s worthy of in-depth discussion.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 impact of a single social media platform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lymedia era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ve use strategies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different social media.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4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is a distribution imbalance in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by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the interaction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evelop integration strategies that are relatively alienated from the destination society after reflection on themselves and foreign cultures and negative adjustment to social media use strategies. Media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divisions form multiple boundarie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form a diverse cultural identity.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cyberspace strengthens the identity within ethnic groups, aggravates the conflict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cross-cultural mobile groups.

Key words: Accultu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groups; Social integration; Media platform distribution

难以跨越的身份：复媒体环境下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文化适应

席 煊

摘 要：近年来大量中国留学生去往海外学习，有关社交媒体如何影响这一跨文化流动群体融入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议题，值得深入探讨。与既有研究关注单一社交媒体平台对留学生社会融入的影响不同，本研究从复媒体时代背景入手，考察中国留学生对不同社交媒体的分配性使用策略及跨文化适应情况。基于对14位中国留学生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中国留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存在分配失衡的情况，在跨国社会关系网的互动中，留学生经过对自身和异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社交媒体使用策略的消极调适，发展出与留学目的地社会相对疏离的融入策略。媒体差异与文化区隔形成多重边界，使得留学生难以形成多元的文化身份。本研究认为，网络空间加强了族群内部的认同，加剧了跨文化交流时的冲突，为跨文化流动群体的社会融入带来新的挑战。

关键词：跨文化；留学生群体；社会融入；媒体平台分配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研究缘起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去往海外求学的中国留学生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海外留学潮引发了学者对于这一跨文化流动群体的关注，其中，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方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备受关注。

近年来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交媒体成为维系个体间远距离关系及社会联结的重要方式。对于身居异域的跨国流动学生群体而言，复数形式的社交媒体使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他们可能因为文化适应等问题，需要来自故乡的物质和情感支持，此时社交媒体为他们提供了与故乡保持密切联系的方式，使他们与既有的社交关系在虚拟空间中得以处于“缺席共在”（Absent Presence）的状态，在数字空间中达成齐美尔意义上的“聚居”，从故乡获得的多种形式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文化休克”的缓冲作用^①；另一方面，留学生们可能渴望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建立自己的交际圈、获得脱离原生文化后独立的生活，此时社交媒体又成为他们建立新的社交关系、理解本地文化、进入本地社会的主要渠道之一^②。复媒体环境下，留学生不断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轮转和摇摆式的使用行为，通过“社交切断”来完成原文化与新文化中不同的两组个人社会关系的维系^③。

对于社交媒体在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是必要的，因为在当下媒介化社会中，社交媒体早已不再只具备无时空限制的联系和互动功能，更成为个人发展社会关系、建立群体和文化认同的主要方式之一。研究留学生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不仅是对于这一跨文化流动群体如何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考察，也是对该群体如何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的关照，更是对在高度全球化和媒介化的当下，文化流动和融合之可能性的思考。

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在个体层面上考察中国留学生是如何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来建立、维系和发展多元的社交关系，并在梳理社交媒体平台的分配性使用与留学生采用的文化适应策略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交媒体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留学生对全新社会文化的融入（此处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的基础上，理解多元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从社交媒体使用的角度考察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现状。

二、文献综述

不同于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等学者将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简单地定义为“两种不同文化群体在接触中导致的文化模式的变化”^④，金（Kim）认为，文化适应意味着“个体在一种文化中完成社会化进程，之后进入一个陌生的文化中，并不断地、持续地、直接地接触

① Lin, Peng, Kim, et al. Social networking and adjustment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2, 17 (7): 421-440.

② 董晨宇，丁依然，段采意. 作为复媒体环境的社交媒体：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平台分配与文化适应 [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 (7): 74-95.

③ Chib A, Malik S, Kadir S Z. Migrant mothering and mobile phones: Negotiations of transnational identity [J].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2014, 2 (1): 73-93.

④ D J Sam, J W Berry.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2.

该文化”^①。

与人类学及社会学对跨文化适应所进行的群体层面的研究不同，传播学领域对于跨文化适应的研究普遍从个体层面展开，即通过了解个体旅居者（Sojourner）在陌生文化环境中如何进行自我调适和人际交往，以研究其再社会化的过程。

目前传播学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存在两种典型的用以分析文化适应的模型，即单维度跨文化适应模型及双维度文化适应模型。前者认为本族文化身份和东道国文化身份是单向连续的线性关系，向东道国文化靠近越多，与本族文化间的联系就越少。这一模型被诟病存在同化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它将留学生文化适应看作一个标准化流程——留学生原文化身份被视为需要克服的障碍，而学习并最终融入留学目的地文化则被视为理想状态。然而，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单维度模型无法恰切地描述留学生群体的跨文化适应过程。因此，学者又提出双维度跨文化适应模型，对上一模型中忽略个体社会互动和多元身份形成的问题进行修正。双维度跨文化适应模型认为，个体在文化适应中会被两种文化共同拉扯，接受东道国文化并不意味着丢失本族文化身份，甚至可以对两种文化身份都保持强烈认同。

虽然当下学界主流观点和实证研究更加支持双维的跨文化适应理论框架，但大部分文化适应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量表还是基于单维度的理论框架进行组织的^②。此外，当下对个体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忽略了个体的历史，量表的维度仅限于表面行为的改变，而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针对跨文化适应研究中的问题，双维跨文化适应模型的提出者贝瑞（Berry）认为，研究者不仅要收集关于文化适应群体一般适应模式的信息，同时也要关注个体从文化抵触到文化接触再到文化适应过程的体验^③。基于个人体验的深度访谈等质化研究方法，在跨文化适应研究中需要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留学生跨越地理空间的流动使得他们社会互动的对象也随之改变，在对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留学生群体的社会互动对象主要有三类：母国的家人和朋友、留学目的地的人、留学国的同国籍群体^④。而与这三类群体的互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借助社交媒体来完成，社交媒体在留学生文化适应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多元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使得当下的留学生身处复媒体环境（Polymedia Environment）。复媒体环境下，留学生通过对不同媒体的使用方式进行差异化定位，来为它们匹对应应的社交关系。当用户采用一定的分配策略将多元的社交关系与不同媒体相匹配之后，即会产生一种“平台摇摆”

① Kim Y Y.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ion [M].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 Ltd, 1988: 31.

② 杨宝琰，万明钢. 文化适应：理论及测量与研究方法 [J]. 世界民族，2010（4）：1-9.

③ G Bernal. Handbook of 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Inc, 2003: 171.

④ 董晨宇，丁依然，段采蕙. 作为复媒体环境的社交媒体：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平台分配与文化适应 [J]. 国际新闻界，2020，42（7）：74-95.

(Platform Swinging) 式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①。这一环境的影响在中国留学生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中尤为明显, 由于中国(尤其是大陆地区)的社交媒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 因此在海外留学过程中, 中国留学生往往需要面对两套截然不同的社交媒体系统, 而这也造就了中国留学生在社交媒体空间中独特的“双面人生”^②。也有学者将中国留学生的这种社交媒体使用特征称为“两栖性”, 即中国留学生会根据信息和社交需求在国内、国外的不同媒体中灵活切换^③。

虽然强调整体性理解用户使用策略的复媒体理论更切合当下留学生对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情况, 既有文献却较多关注其在某一特定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行为, 鲜少以组合式的视角考察留学生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其中, 对于中国留学生融入对抗性新环境时采用的具体媒体使用策略的研究——即这一群体在网络空间中面对文化冲突、展开文化调整并完成文化认同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更是少之又少。

大量既有文献论证了媒介使用与文化适应之间具有显著关系, 学者基本共识于东道国媒体的使用对离散族群的跨文化适应具有促进作用, 然而在关于本族媒体的使用对文化适应的影响上, 学者则提出了相悖的观点^④。有观点认为本族媒体的使用会阻碍文化适应, 因为本族媒体上具有更多原文化元素^⑤, 且这些元素被用于维系原有的文化纽带, 并有助于在较长时间内保留本族文化身份。而另有一种观点认为, 本族媒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跨地域流动者融入新社会的进程, 但其能够帮助降低移民群体的焦虑情绪和面对陌生环境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总体上仍然对文化适应有促进作用^⑥。因此, 聚焦于复媒体环境下的留学生群体, 对本族媒体的使用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留学生群体文化适应的过程仍是一个尚未被清晰梳理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

深度访谈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对跨文化流动群体的研究之中, 深度访谈法的优势在于能够从受访者的个体经历和个人视角出发, 审视跨文化流动群体的生活境遇, 从而获得对该群体更深入的理解和洞察。本研究对14名正在国外留学或有过国外留学经历的中国学生进行60分钟左右的半结构深度访谈, 如表1所示。访谈自2022年12月17日起, 至2023年2月2日结束。首先, 受

① Edson C Tandoc Jr, Chen Lou, Velyn Lee Hui Min. Platform-swinging in a poly-social-media context: How and why users navigate multipl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J].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9, 24(1): 21-35.

② 赵瑜佩. “世纪潮一代”的网络社会资本重构: 对比在英流寓华人Facebook和微信的数字化融入 [J]. 国际新闻界, 2018, 40(3): 40-62.

③ 张少科. 离散族群多元文化认同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 [J]. 国际新闻界, 2018, 40(3): 83-100.

④ 丁璐. 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与跨文化适应 [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⑤ Wei Na Lee, David K Tse. Changing Media Consumption in a New Home: Acculturation Patterns among Hong Kong Immigrants to Canada [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13, 23(1): 55-70.

⑥ John W Berry.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J]. Applied Psychology, 1997, 46(1): 5-34.

访者包括与研究者本人具有面识关系的 6 位留学生。之后，研究者通过这 6 位受访者介绍以及互联网招募另外 8 名受访者，以避免因为被访者集中来自某一学校或专业而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

表 1 被访者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序号	性别	年龄	留学地	留学时长	专业	学历	访谈方式	访谈时长
S1	女	24	英国	2 年半	经济	硕士	微信电话	68 分钟
S2	男	22	美国	3 个月	人工智能	硕士	微信电话	52 分钟
S3	女	22	英国	2 个月	新媒体与文化	硕士	微信电话	66 分钟
S4	男	24	美国	5 年	数学	硕士	微信电话	71 分钟
S5	男	20	美国	2 年	人类学	本科	微信电话	56 分钟
S6	女	25	英国	5 年	金融	硕士	微信电话	61 分钟
S7	男	21	美国	3 年半	计算机	本科	微信电话	66 分钟
S8	女	22	美国	3 个月	教育	硕士	微信电话	58 分钟
S9	女	21	美国	3 年半	教育	本科	微信电话	62 分钟
S10	女	23	美国	5 年	教育	硕士	微信电话	52 分钟
S11	男	22	英国	2 个月	社会学	硕士	微信电话	57 分钟
S12	男	21	美国	3 年半	会计	本科	微信电话	55 分钟
S13	女	23	美国	4 年	文学	本科	微信电话	62 分钟
S14	女	22	英国	2 个月	艺术	硕士	微信电话	61 分钟

被访者在性别、年龄、留学时长、专业和学历方面具有多样性，这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因受访者同质化导致的研究结论偏差。具体而言，受访者均来自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第一大目的地美国（9 人）和第三大目的地英国（5 人）；受访者包括 5 名本科生和 9 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 8 名女性和 6 名男性；受访者年龄范围在 20 岁到 25 岁之间；14 位受访者来自 12 个不同的专业；受访者在海外生活时间从 2 个月到 5 年不等。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以及部分受访者居住在海外，访谈通过微信语音电话的方式进行，所有访谈均在获得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已全部通过讯飞听见软件转换为文字，并按照学术规范进行匿名化处理。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在阅读文字稿的基础上提取其中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并最终形成本研究的结论。

四、研究发现

（一）对抗网络文化休克：母国社会的文化联结与情感维系

由于中国社交媒体环境相对独立，中国留学生群体在接触本族关系与留学国关系时，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套社交媒体系统。本研究的访谈资料显示，中国留学生在出国前更习惯于使用微信、QQ、微博和百度贴吧等本土社交媒体平台，虽然也可能会下载 Twitter、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国外社交媒体平台，但正如受访者 S11 所言：“在国内用 Twitter 很不方便，需要自

己翻墙，而且也不稳定。其实我上 Twitter 是为了看看关注的名人都发布了什么言论，这些言论基本上会被人‘搬运’到微博上面，所以我直接看微博就好。”政治因素、技术限制，以及作为替代方案的国内社交媒体的存在使得留学生在出国前很少有动机接触国外社交媒体平台。

美国人类学家奥伯格（Oberg）将“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的现象定义为“文化休克”^①。而在日常交际与社会交往高度媒介化的当下，面对一套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社交媒体系统时，初入西方社会的中国留学生产生“网络文化休克”反应几乎不可避免。留学生个体进入到不熟悉的网络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流手段而容易产生迷失、排斥甚至于恐惧的情绪。受访者 S9 提道：“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发现，周围的外国同学们都在使用 Facebook、Twitter 和 WhatsApp，他们所有的社交活动都在这些平台上完成。比如小组讨论、导师的作业要求和学校的社团活动之类的都会发布在 Facebook 上面。但是我在出国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平台，导致我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不了学校生活。有半个学期的时间，我几乎是闭门不出的状态，就没有什么社交，也不参加户外活动，偶尔别人喊我聚餐和参加派对什么的我也不想去。”

与大陆地区完全不同的社交媒体文化，使得留学生在初入英、美国家时被动地隔离于当地社交生活。受访者 S9 如此痛苦的原因，仅仅是因为社交媒体使用习惯与周围人不同，在留学前三个月的时间里，还未养成每日登陆 Facebook 查看动态和消息的他几乎没有正常的社交活动。英美大学生社交生活的“Facebook 化”得到了其他受访者的印证，受访者 S2、S7 和 S14 均提到了大学中很多社交活动是以户外运动和派对的形式开展，而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一般会在 Facebook 上邀请同学参加，如果留学生没有使用 Facebook 的习惯的话，会错过很多发展新的社会关系的社交机会。

为了对抗“网络文化休克”，初入西方社会的中国留学生更倾向于选择通过国内社交媒体联系母国的社会关系，来获得情感支撑，而非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积极发展新的社会关系以获得帮助。此外，由于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达，相对于日韩等亚洲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而言，中国学生的本国互联网产品选择更多，因此，留学生得以继续通过各类本土社交媒体，将人际网络固定在中国大陆之内。

除了获得情感支持，“惯性”也是初入新文化环境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国内社交媒体对抗网络文化休克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美国生活了 3 个月的受访者 S2 表示：“我不使用 WhatsApp 的原因只是我用不习惯，我还是习惯用微信和人聊天；不用 Twitter 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把生活记录和‘吐槽’之类的内容发布在微博上，就没必要多此一举去下载 Twitter。”

^① Oberg K. Culture shock: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 [J]. Practical Anthropology, 1960, 7 (4): 177-182.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在留学目的地国生活了不到4个月的受访者均表示，不接触或极少接触当地社交媒体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困扰。正如2个月前抵达英国的受访者S11所说：“我们专业的中国学生很多，大概占了90%，所以我接触到的基本都是国内同学，大家（指中国留学生）平时也会抱团一起玩儿。我新认识的朋友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在微信上联系，他们都不用WhatsApp和Snapchat那些，所以我也没有理由用。但其实不用也无所谓，我也没觉得非要和外国同学搞好关系或者成为特别好的朋友。”

受访者S11提到的“抱团一起玩儿”是中国留学生应对新的社交媒体环境的初期常用的策略，这种“同族裔抱团”行为背后是贝瑞所提出的“分离”式文化适应策略，即在既有文化身份和新的文化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偏向于保有原文化身份而拒绝融入新文化的一端，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并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受访者S11观察到，“刚到这里的中国留学生都不会很迫切地想要使用新的（社交）媒体，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社交）媒体可以用，就没有理由去用这里的（社交）媒体了”。由此可见，中国留学生将国内的社交平台视为一种清晰的文化边界，并借助对国内和国外社交平台的差异化处理，完成对这两组社交平台的观众隔离（Gating Audience）^①，并建立不同的情感距离。

留学生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利用社交媒体建立或维系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留学生个体亟需找到一种现实可行的途径恢复感情上的平衡，解除由“文化休克”所引起的心理危机，而这种途径一旦建立，则会被视作是有效且必要的，并成为难以更改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在初入西方社会时选择“分离”式文化适应策略，对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融入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留学时间长达数年之久的留学生而言，在留学生涯最初几个月选择的“分离”策略，不仅塑造了他们之后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更使他们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跨文化适应困境。

（二）尝试融入新社交文化：媒体使用策略的调适与挫败

过往针对留学生这一跨文化流动群体的研究均表明，双文化取向有利于留学生在学校取得更好的表现^②。由于内部或外部因素的驱使，本研究所访谈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都尝试摆脱对原有社交媒体和华人社交圈的依赖，在新的互联网社交空间展开互动、建立联系。其中，一种常见的外部因素是“学业需要”，受访者S6详细讲述了这种基于课业需要的互联网社交是如何帮助自己扩展社交空间的：“我们每个学期有不同的课程，这导致我的同班同学的人都不一样，

^① Alice E Marwick.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1, 13 (1): 114-133.

^② Patrick Simon, Maurice Crul, Hans Vermeulen, et al.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J]. *Population*, 2004, 59 (3/4): 638.

所以社交圈自然而然就会扩大。你每一门课去组一个新的小组，然后你会认识可能四五个人，这些人都是随机分配的，然后你下个学期会再选课，然后认识新的一批外国同学。小组成员之间可能会相互 follow（关注）一下 Facebook 账号这样，也有可能不会 follow（关注），就挺随意的吧。”

虽然小组讨论等课业需要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拓展网络社交圈的外部助推力，但是当“课业需要”成为中国留学生与外国同学之间社交的中心话题时，却潜在地将中国留学生与外国同辈人的互动内容进行了限定，这也意味着留学生们并未与外国同学建立起一种脱离课堂讨论而存在的、日常性的社交关系，反而建立了随着课程的变动可以随意替换和终止的暂时性关系，而这样的社交关系显然不利于留学生真正融入当地的社会网络。正如受访者 S8 所说：“我感觉自己完全把 Facebook 当作一个完成作业的工具，比如说小组讨论和导师研讨会之类的，都会在 Facebook 上面讨论。我和外国同学的交流基本上就是很公事公办的态度，我不会和外国同学讲与作业无关的东西，因为我怕那样别人会觉得我是在聊闲天，拖累作业进度。”

有研究者认为，如何在母国文化和留学国文化的拉扯间定位自我身份，会影响留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策略，对留学国文化有较强渴望和归属的“融入型”留学生会偏向于选择更为积极的手段融入当地文化^①。本研究通过访谈发现，在主观上有意愿融入当地文化的留学生，确实会采取更加主动的行动与当地人建立社交联系，然而，过往研究却往往忽视了这类行动的后续，即跨文化群体与本地人是否能够建立起一种持续且亲密的社交关系。事实上，积极结识本地人的行为并不一定导向稳固长久的个人交往，反而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文化隔阂的存在，受访者 S4 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我大一的时候曾经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去融入美国人的生活。大一开始的时候，我在 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加了很多很多人，有一个学校的同学，也有平台给我推荐的不认识的人。但是这个冲动差不多只持续了一个学期，后来发现自己实在是融入不了。我发现，和那种现实中都没什么交集或者说共同经历的人，在网络上就更没东西可聊。基本上就是打个招呼，然后说一下对美国的认识，或者说一下到过美国哪些地方，然后就不知道该聊什么了。后来我和那些人没有再联系过了。”

纵使中国留学生进行了诸多走出华人社交圈、融入当地社会关系网络的尝试，但是这些努力却往往以“实在是融入不了”告终，留学国社交媒体平台也往往随着社交失败的尝试和社交热情的衰减而成为“公事公办”的工具。

具体而言，虽然 Twitter 和 Instagram 在技术可供性上与微博有较大相似程度，但是中国留学生却很少在这两个社交平台上进行社交和互动。相较于“准日记”定位，中国留学生更多地将

^① 董晨宇，丁依然，段采意. 作为复媒体环境的社交媒体：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平台分配与文化适应 [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 (7): 74-95.

这两者视为信息媒体或搜索工具。相比之下, Facebook 由于经常被用于小组讨论, 在使用形式上更加接近“社交”, 但是留学生对其的使用也仅仅停留在课业需求上, 没有将其视为能够提供情感支持的角色。突出工具性而减弱社交性, 是中国留学生在使用留学国社交媒体时的策略。这种工具式使用也意味着他们很少与该国群体进行强烈的、亲密的、情感导向的交流, 难以在留学国文化中获得情感依附和归属感。

(三) 双重社交媒体文化下的适应困境: 难以形成的多元文化身份

与移民群体与同辈人的社交互动相关的研究表明, 即使随着定居时间增加, 移民扩大了与整个社会的交往, 但其与所属族裔的联系仍然保持强大, 显示出一种“内群体偏好”^①。本研究访谈的中国留学生均表示, 与国内亲友或当地华人的联系要远多于与其他族群的联系, 且这一结论并未随着定居时间增加而改变。

如果将目光聚焦于那些在留学国居住了四年以上的中国留学生, 在分析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策略以及社交空间的拓展过程后, 会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 他们在留学初期形成的失衡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 最终对文化适应过程造成了整体性的影响。这种整体且连续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到达留学国初期对国内社交媒体的依赖性使用及对国外社交媒体的工具性使用, 使得留学生在社会交往中渐渐形成偏向本族群的“惯性”, 这种“惯性”不仅表现为在网络空间中更加亲近华人群体, 更体现在将当地主流群体置于现实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边缘位置, 换言之, 中国留学生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迫地将自我排除于留学国的主流文化之外。

中国留学生扩展人际关系网络的方式也是非常“中国化”的。对于社交圈是如何逐步限缩于华人群体之内的, 受访者 S12 给出了简洁且恰当的描述: “我感觉我是在同时接近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时候, 一点点逐渐向中国朋友们靠拢。我之前强迫自己去和这里的人多接触, 但那种 compulsion (强迫行为) 真的给了我很多压力, 让我觉得可能人际交往这件事都没有那么单纯了, 好像我是带着任务去和外国人聊天一样。但是后来我就比较顺其自然, 觉得和中国朋友们待在一起更舒服, 所以我不再要求自己非要去认识外国人了。”

在对中国留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进行研究的时候, 一个需要被讨论的问题是: 借由互联网同时接触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这件事本身, 会对留学生的文化适应过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种较为常见的影响是, 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下, 处于离散状态的留学生得以反思国内的社交文化, 对国外社交媒体进行批判性思考。受访者 S5 认为: “美国社交媒体, 包括新闻媒体上的中国形象都很负面, 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在我看来很荒唐的言论。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人有一种恶意, 而

^① Hamm, Jill V. Do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The variable bases for African American, Asian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adolescents' selection of similar friends [J]. Dev Psychol, 2000, 36 (2): 209-219.

不仅仅是 stereotype（刻板印象）。他们会恶意揣测中国发生的事情，会故意扭曲或者剪辑一些消息，或者编造假新闻。我个人觉得这不仅仅是由偏见造成的，还有一些政治上的原因在里面。”对西方媒体的批判思考与媒介素养的提高，使得中国留学生对诸如 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展示西方意识形态的舆论场抱持观望甚至敌意的态度，而这种排斥的态度显然无益于留学生的文化融入和身份认同。

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隔阂强化了留学群体的文化冲突，政治和文化立场的巨大差异使留学生产生了一种清晰的“你我有别”的身份边界。受访者 S5 的经历正如 Clifford 所言：“异域而居是一种生活在这里（Here），又与那里（There）相连的意识，完全是冲突与对话中的文化与历史产物。”^① 这种身份的划分使得中国留学生在与非本族裔群体的对照中，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正如受访者 S2 所说：“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对政治特别不敏感，也没有说特别意识到自己的中国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出了国之后反而时时刻刻被提醒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另一方面，少数群体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话语权不平等以及边缘化问题突出，感到被边缘化的留学生只能与留学国的居民建立起初级或表面的联系。国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对中国人的成见使留学生群体不再愿意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发声，进一步导致了中国留学生无法建构理想的跨文化社会关系网络。国内与国外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双重文化环境，加强了留学生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使留学生自觉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捍卫本民族文化。这种为本国文化大声疾呼的尝试多以不受重视而告终，正是国外网络空间中对中国留学生的偏见和歧视性话语，让身为弱势和边缘群体的中国留学生强化了对本族文化的认同，最终远离当地的主流社交媒体，转而回归国内社交媒体，这类留学生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逐步变为边缘而沉默的用户。

受访者 S4 从另一个角度分享了双重文化环境给自己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我发现就是社交媒体上大家的争吵都很没有意义，比如说涉及两个国家的冲突啊、意识形态啊这些。我后来意识到就是文化上的，包括说政治上的这种认知是不一样的，国内的是一套认知，然后国外又是另一套认知。这种观点不同本来就是两个国家在政治啊意识形态这些方面是不一样的，很正常，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吵，存在不同观点不是很正常吗？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我会说我是变得更包容了，知道去尊重别人有跟你不同的看法，知道这（不同观点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同时接触到两种文化能够让留学生变得更加包容，在社交媒体上面对与自身立场相对立的言论时也能够保持开放或尊重的态度。不过，这种包容和开放并非是对留学国文化表示赞同，也无益于融入当地主流文化，而仅仅是一种以不作为应对攻击本国言论的相

^① Clifford J. Further Inflections: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the Future [J].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4, 9 (3): 302-338.

对消极的态度。“不听”和“不说”的社交媒体使用策略（这里用“不使用策略”更恰当一些）反映出双重文化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留学生的社交欲望。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在社交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层面为中国留学生文化适应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新冠疫情依旧肆虐于英、美两国的当下，留学生面对的是线上课程和户外活动取消带来的与外国同学的进一步社交隔离，以及社交媒体上对新冠疫情的政治化与对中国更严重的污名化。对于受访者 S3 而言，新冠疫情意味着“我与这里的人没有任何线下沟通了”，而且“上了 Twitter 一看，很多人都认同‘中国病毒’这种叫法，心里挺难受的”。

在试图展现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现状时，留学生如何衡量自己的跨文化适应程度非常重要。面对“你会如何评价你的跨文化适应”这个问题，受访者们的回答相当一致。相较于认同本地主流文化或认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经转变，他们认为自己的融入只是一种在社会规范层面而非文化层面的融入，一种表层的而非深度的融入。受访者 S6 在评价自己的跨文化适应表现时提供了非常有趣的回答：“你要说适应的话，我觉得成功的，但你要说融入的话，我觉得肯定是不成功的。我觉得反正知道他们是这样子的，我会觉得他们挺好的，但让我变成那个样子，我觉得没必要。”在此，“适应”与“融入”中的前者指向被动地观看和识别他者文化，而拒绝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后者则指向更为主动和开放的文化观念的实践。

戈登（Gorden）的“文化认同模型”将跨文化适应过程分为七个阶段：行为上的同化、结构性同化（即与主流成员或组织建立起正式联系）、文化身份同化（即产生对主流文化和群体的归属感）、联姻性同化、态度—接受性同化（即对主流社会和主流群体不再抱有偏见）、行为—接受性同化（即不再有歧视性意识）和公民性同化。从这一模型出发，可以发现留学生大多停留于行为上的同化和结构性同化两个阶段上，并未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留学国文化，更没有达到过往研究者所谓的“持有双重文化身份”的阶段。中国留学生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始终没有转变这一点是自觉的，正如 S1 所言：“我不认同他们文化上面和政治上面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可以 在生活上或者在社会秩序上很好地融入。”

对于曾经生活在同一或相似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留学生群体而言，分享相同的符号以及其背后相近的价值、象征、规范、文化，能够有效地在异域文化中“重建”一个熟悉的意义空间，这种共同体的建构对于消除个体因边缘化而引发的不安和孤独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正因如此，许多中国留学生最常用的社交媒体仍然是中国的微信、微博和小红书，而非英、美国更加流行的 Facebook、Twitter 或 Instagram 等，即使是在国外社交媒体上互动最多的也是与自己相同身份的中国留学生。相较于融入留学国文化，中国留学生的社交媒体实践更接近于在互联网空间中重新构建虚拟共在的族群共同体，又或者是他们从未真正脱离这个共同体走入新的社会环境中。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证实，在网络空间中，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并没有如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得到消解，相反，社交媒体等打破时空界限的传播方式强化了不同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加大了文化间的差异，并为作为离散者的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带来新的挑战：社交媒体作为新的社会交往方式虽然解决了留学生群体跨文化适应的工具性问题，但却仍然难以解决跨文化适应在个体情感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交流困难；由于社交媒体文化不同，中国留学生通过互联网与当地群体建立起的社会关系（无论是网络上或是现实中）大多是流动而脆弱的，他们难以在留学国获得情感依附和归属感；即使在发声限制较少的社交媒体上，中国留学生这一少数族群依旧没有获得相对平等的言论空间，他们在互联网空间中受到歧视和非议，最终主动或被迫成为主流文化之外边缘而沉默的人。

此外，本研究在探索中国留学生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以及跨文化适应的动态过程时还发现，对于相对容易适应的留学国社会规则和规范，留学生倾向于采用同化的文化适应策略，而对于留学国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留学生则更倾向于采用分离的策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留学生并未形成多元文化身份。

“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媒体研究仅仅是关于‘研究媒体’的。”^①对媒体研究者而言，应当将媒体置于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在媒体使用与其他社会行为的互动中分析媒体的角色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社会过程，以此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论调。既往研究者大多从结果的视角出发，关注社交媒体使用对于离散族群的跨文化适应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然而却极少从过程的视角出发，关注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策略是如何形成、改变并相对固定，也没有探究在跨文化适应这一过程中，社交媒体在不同阶段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本研究则通过梳理中国留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策略的形成以及在生活变迁中变化的过程，试图弥补既往研究视角过于静态的缺陷。

本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研究者收集的访谈案例均来自留学于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而没有对非英美两国的中国留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考察，这导致本研究无法在整体上勾勒出中国留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与跨文化适应的现状；其次，本研究在搜集经验材料时遵循了信息饱和的原则，然而相比中国留学生的庞大基数，14名中国留学生的研究样本仍然十分有限；最后，由于篇幅及能力限制，本研究未能提供留学生社交媒体使用分配失衡及消极调适导致的后续社会影响，而只是从个人层面谈及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困境。以上种种不足之处，可以成为后续相关研究的着力点。

^① Shaun Moores. Media, Place and Mobility [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28 (2): 217-219.